

词典编纂学

LEXICOGRAPHY

——〔英〕罗伯特·伯奇菲尔德——

商 务 印 书 馆

词 典 编 纂 学

LEXICOGRAPHY

附：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

〔英〕罗伯特·伯奇菲尔德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词典编纂学

[英] 罗伯特·伯奇菲尔德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2³/₄印张 60千字

1980年1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册

统一书号: 9017·957 定价: 0.48元

出版说明

一九七九年五月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词典部总编辑罗伯特·伯奇菲尔德博士应商务印书馆邀请访华，作了关于词典编纂学和关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学术讲演。现将这两个讲演译成汉语，连同原文印成小册，供工作参考。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79年6月

目 录

词典编纂学	1
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	23
附录(原文):	
Lexicography	38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65

词典编纂学

朋友们：

我从英国牛津大学来到中国，我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

*

*

1. 1. 三个星期以前，我注意到一只鸟在我的花园一堵高高的浓密多刺的篱笆上搭了一个窝。我很想看看窝里有没有这只鸟下的蛋，可是这窝搭的位置非常巧妙，我根本看不见。从篱笆的一边，因为它高过我的头，我即使踮着脚也看不见。从篱笆的另一边，虽然这边的地势高一点，可是鸟把窝搭在最浓密、最多刺的地方，我还是看不到。它隐藏在人的目力所不及的地方，并且保护得很好。任何一个和单词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构成某一种特定语言的单词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得见这些词印在纸上，挂在嘴边，但由此再进一步，就很难深入地看透它们。要理解一种语言如何起作用，最好的方法是做一个词典编纂学家，其次是做一个语法学者。很少人能兼通这两种艺术，因为生命太短促了。现在有了计算机，就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

下面我将尽可能描述一下词典编纂学这门艺术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以牛津词典为代表的西欧词典编纂学。

1. 2.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解释，词典编纂学是“辞书或词典的编写工作”，一个词典编纂学家是“一个编写词典的人”。这

些定义似乎是够明白的了,然而只有在你翻阅各种词典时,更重要的是只有在你实际地编写一本词典时,这种复杂性才会显露出来。任何一个编过词典的人,就会变成我称之为“让字母磨练过的人”。在字母表里的每个字母中,你会发觉那个字母特有的复杂情况。除了这些复杂情况之外,每一部词典都反映了一套语言、社会、教育和政治方面的理想和信仰,必须弄清这些才能开始词典的编纂工作。有些情况反映了这种语言本身的性质。例如拿某一种印欧语来说,是否一个动词的所有的动词形式都列在不定式下面,还有复合词如 waterfall 是否应该放在中心词 water 的下面,或者是否它们都应该严格地按字母排列,分条列出。

词典可以是单语的(这种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常见的),或者是双语的,有时也可能是多语的。第三种多语词典,通常是以专题为条目的词典,其中某一专题条目的中心词汇,比如‘印刷’一词是几种文字并列的。在西欧有大量的这样多语词汇汇编,其中多数包括英、德、法和俄等语种的选条。他们一般没有定义,而是仅仅列出对译词。

例如:	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
	book	Buch	livre	(Kniga)

我在这个讲话中侧重讲述英语单语词典编纂学的原则、传统和问题,也讲一讲双语词典编纂学的类似的各个方面。我也要谈一点关于四个世纪以来汉语对英语的影响。最后,我还要简略地讲一下计算机在词典编纂学中的作用,作为结束。

2. 首先,我想提醒你们,词典编纂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学者或一般公众对它都不很了解。英国有五千万人,只有一小部分人从事编纂词典工作,而在这些人中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人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词典编纂学家约翰逊博士,詹姆斯·默里爵士,维廉·克雷吉爵士,H.W.福勒和其他一些人都去世了,可是英国人民还是隐约地认识到正是由于有这些伟大的人,词典才有现在的形式和体裁风格。多数英国人至少有一本词典经常使用。多数情况下是一本牛津词典。在一个家庭的书架上,你大体上会料到能找到一本儿童词典,一本用于一般用途的标准词典,如《简明牛津词典》,还有一两本为出国旅行用的小型的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双语词典。但是,编纂词典学的原则和编写词典中所遇到和必需克服的诸多困难,一般的词典使用者是根本不了解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词典编纂学家本身之外,几乎没有人有必要去给一个词下定义。假如你请一个普通人给一个象‘马’、‘盘子’或者‘美丽’这样的词下定义,其结果经常是楞了半天,支支吾吾,然后说出一个很蹩脚的定义。我们在牛津收到的质疑和询问的信件,几乎都是集中问我们某本词典中的一个词条,或仅只是词条的某一部分,或者问一个根本没收录的单词。几乎没有人了解词典是怎样编的,词汇是怎样选的。我遇到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认定词典是一个委员会编辑的,委员会的成员围着一张桌子坐好,把他们认识或是听到过的词列成一个词汇表。大家知道,本世纪出现了大量的新词和词的新义。所以不可避免地一再有人问我们的问题,就是:“那么,你们是

怎样处理的?”

英国同其它国家一样,编纂词典的实践,比较起来时间不是很久远的。罗伯特·考德莱的《按字母顺序英语词语表》是第一部带有词典特色的英语词典,出版于1604年,也就是还不到四百年以前的事。而另一方面,中国最早编纂的词典却早好多个世纪,约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

3. **牛津词典部** 正好一个世纪以前,1879年,英国的词典编纂来了个大跃进,詹姆士·默里爵士开始编词典了,他编的这部词典后来取名《牛津英语词典》。他在牛津建立了一个编辑班子,但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这部十二巨册的大词典才编纂完毕。在此期间,牛津大学出版社找到了其他一些编辑,特别是人才难得的亨利·华森·福勒,请他们负责编纂一些较小型的派生性词典,今天在这里展出的是其中的大部分,是最新的版本。到1933年,这个编辑班子在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之后,就解散了。这些小型词典的维修工作,由这些编辑个人在自己家里进行。1939—1945年的战争结束以后,人们不满意这种散漫的工作方法,因而我于1957年被指定来建立一个新的牛津词典部,努力保证各种旧牛津词典的新版以及新编词典妥善地处理好收词释义的工作。如今任务已基本完成,除了我们有意不接受的某些词典工作,如多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外,我们现在有力量承担任何新的词典编纂任务。

现在不妨简略介绍一下牛津词典部的情况。我们这个班子有三十多名男女同事,在牛津大学一所建于十九世纪初期、颇为富丽堂皇的建筑里工作。我们大部分的人在编

《牛津词典补篇》。一个小一些的组在编各种派生性的牛津词典，另外一个小组编写德语和俄语词典。其它一些双语词典，包括像拉丁语这样的古代语言以及像土耳其语、法语以及一些非洲语这样的现代语言的双语词典，是由词典部以外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并且把词典编写工作同他们在大学里的教学等结合起来。

我们有一个图书馆，约有八千册书，包括全部主要的英语词典以及各种双语词典、科技教科书等等。我们有一些同事在伦敦各大图书馆工作，我们在牛津研究不了的某些词条，就由他们来做必要的核对和研究的工作。词典部也有人在华盛顿和波士顿工作。有些词条要在其它一些国家进行核对，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我们就通过联系，请那些愿意承担的本国学者负责这项必要的研究工作。

也许我们的主要财产是二百多万张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例句卡片(六公分长四公分宽)，是在系统地阅读每一种当代的原始资料中摘录下来的，包括了小说、诗歌、学术杂志、教科书和报纸等。这个资料库是用传统的手工方法编起来的。它不是由电子计算机编集的。在现阶段，建立一个电子计算机的资料库不但很困难，而且是昂贵的。

在德语方面，我们在 1977 年同德国曼海姆的文献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共同编写并出版一系列的双语词典。这一安排的第一个成果将是今年晚些时候出版的牛津 / 杜登德英图解词典。这是一部大型的一卷本词典，有一系列的图，

附以德英两种文字的物件名称，每种物件都在图里得到表示，如牙科医生的全套手术用具，摩托车的全部零件，用线、绳等绕着打结时使用的许多范围很广泛的名称，等等。希望同文献研究所的这一安排成为词典战线上的一个样板。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其它许多这样的联系，我这次来到中国也抱有这个目的。

4. 词典编纂工作的任务 词典编纂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某一种语言的词汇表，标明词性、发音和派生词并用那些适于用作定义的词汇来给这些词目作释义，但所用词汇不能超出本词典的词目。词典工作者必须超脱出他所工作的那个团体，释义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客观的描述。他不应该删改词汇或释义，供儿童使用的词典是个例外。如果有篇幅可以加进例证，这些例证自然地将反映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性质。理想的是，例证应该摆脱个人偏见，可是在英国的传统上，违背这种理想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就是在约翰逊博士和詹姆士·默里爵士编纂的那些卓越的词典里，这种例子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如，约翰逊博士把 *budge*（推动）、*fun*（玩笑）和 *clever*（聪明）斥为“低级用语”，把 *excepting*（除非）叫做“不正确用语”。同样地，默里爵士对苏格兰词语的选收特别挑剔，甚至挑剔苏格兰词语的发音，而他的英国同事们是不会被允许这样做的。

在当代的英语词典编纂工作中，词典编纂者在对某些方面的词汇的处理上有相反的看法。以下几方面的词汇是属于这种敏感领域内的。

正确与不正确有争论的用法，如：*disinterested*

一词是否应列出“不确切的义项 *uninterested*”(不感兴趣的, 不关心的), 还是只列出“确切的”义项 *detached*, *objective* (无私的, 公平的, 无偏见的); “*data*”用作单数名词是否完全让进入词典, 如果可以这样, 是否应注明为不适用或不加任何标记; 是否应收录“*between you and I*”这样的用法而不收正确形式“*between you and me*”, 如果收录了, 它们是否应注明为不适用。

冒犯了使用这些词汇的某人或某些人们的词汇, 尤其是表示种族的和宗教弊病的词汇, 是否可让进入词典以及它们应怎样用签条标明。我在考虑象具有“贪婪的人”的意义的 *wog*, *dago* 和 *Jew* 这些词。如果 *radish head* (小萝卜头)的汉语对应词, 见于中国的小说或中国的报纸, 被用来咒骂日本人, 那么, 它是应该收入汉语词典呢, 还是应该删去, 或怎么的?

有关两性的和排泄的功能的词汇是否应该列入词典? 它们应该怎样释义和怎样贴上标签?

如何处理有关少数派宗教和信仰的词汇? 例如, 在英国, 如何处理有关唯灵论 (*Spiritualism*) 和基督教科学派 (*Scientology*) 的词汇。

这些问题大部分是能够通过合理的思考和使用适当的警告符号来解决的, 但必须制订一套明确的方针, 才能开始词典的编写工作。

5. 在百科性词条的总的方面, 尤其是在所要处理的专有名称的选择方面, 词典编纂者面临着更为困难的选择。美国

传统喜爱收录大量专有名称,《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三版)》中的释义也往往带有明显的百科全书的特色。英国词典则往往收录那些已有转义的专有名称,如收了 Gladstone,因为它是一种旅行包的名称,而不是十九世纪政治家格拉德斯通 (Gladstone)。只要把《简明牛津词典》和《韦氏新大学词典(第七版)》加以比较,就立刻可以看见其不同。例如韦氏第七版词典把 Brunhild (德国传说中的王后)、Little League (八至十二岁男孩棒球俱乐部)、Mary Magdalene (一个被耶稣治愈邪鬼附身的病的女人)这样的条目,都列为词条,而《简明牛津》则一条也未收选。

我只要引用《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三版)》中 hotel 一词的如下释义,就可以阐明我所说的关于许多美国词典的百科性质的意思了:

一个包括许多房间的建筑物,主要为过客过夜提供便利的设施,有带电梯设施的几层楼,通常有一个与街道一般水平的摆有安乐椅的门廊,有各种分隔间,可作吃、喝、跳舞、展览和小组会议(如店员、大会服务员等的会议)之用,有向内开和向街边开的门的商店,供应旅行者特别感兴趣的商品(如衣服、礼物、糖果、戏票、旅游票),或提供个人服务(如理发、擦鞋),有可自由使用的公用电话间、写字台、盥洗室。

对照之下,《缩编本牛津英语词典》给 hotel 一词下的定义就很简单:旅馆,尤指高级旅馆。

6. 如果说商务印书馆 1978 年出版的优异的《汉英词典》是带有典型性质的话,那末,看来中国的传统在收录大量专有

名词方面是更接近美国的传统，而在相对地不选收百科性的材料方面则更接近英国传统。

例如这词典正文中选收的古巴、朝鲜、瓜德罗普(岛)、关岛、盘古(中国神话中的宇宙创造者)和许多其他专有名称,均未被列入附录;而在附录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名称以及它们的首都名称和其主要货币名称。主要的百科性词条是政治性词条,例如古田会议(“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其他方面,大多数词条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核心部分提供了通用的英语对应词,避免百科性的解释,在双语词典中,这样做是恰当的。

7. 因此,我的第一论点是,词典编纂学是不为词典使用者所很好理解的而有几分神秘的艺术;就他们希望收选什么和希望省略什么而言,每个国家的传统是非常不同的。一会儿,我将进一步举例说明这些不同的传统。

.....

- 8.1. 双语词典^① 现在让我谈谈双语词典。一部两用双语词典的编纂者的任务,首先是选好他们所处理的两种语言的每种语言的词汇,然后是对每个项目提供准确的译文,既要考虑每个语体方面的细微意义,也要考虑某一词语的使用范围。当人们处理俚语或不规范的词语时,就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困难,这是因为人们很难检验这些词语在每种语言中使用的范围,也很难明确对应的词语在每种语言中是

① 参看 Ali M. Al-Kasimi:《语文词典和双语词典》,莱顿,1977。

否都同样属于习惯的用法。拿现代希腊语的 *po po po* 这个语词为例来说,它是希腊语中用以表示惊异、震惊等的一个惊叹词,但在其他西方语言中就找不到它的对应译语。这个词粗略地可译作法语的 *oh la la*, 或译作英语的 *tut tut* (哎呀呀₁),但不可能找到完全等义的东西。同样,如果归宿语言的讲话人没有听说过有亚当 (Adam), 也没有种过苹果 (apple), 那末,英语的“亚当苹果”(译注——Adam's apple 现指“喉结”。希伯来语中“亚当”一词指男人,“苹果”亦指突起物,系今“喉结”。英语最早译文有误,故易引起疑难)就不能译为相似的含有比喻意味的语词 (Al-Kasimi, P. 66)。也有人告诉我说,一本计算机科学的书上的英语副标题 “How it works” (如何工作), 就不可能译成汉语, 必须设计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副标题来予以代替。在采用一种规范化处理方法时, 各国词典编纂者认为恰当的程度, 也因国家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欧, 英、德、荷、瑞典等讲日耳曼语国家的词典编纂者,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开始, 就采取一种比十八世纪或更早的时期更为详细明确的处理方法。在这些国家出版的词典中, 通常选收大量的口语和俚语词汇, 包括和两性关系、排泄现象以及麻醉药品有关的词汇, 一些时间性很强的新词, 也大量收选了。在法、意、西等讲罗曼语的国家以及在苏联, 词典更讲究规范化, 有争议的词汇和新词, 受到严格的减删。在这些国家, 词典编纂者喜欢把俚语词汇、方言词汇、商标名称、侨民词汇 (如加拿大法语) 以及各种边缘性词汇, 收集在专用的词典里, 不是收集在通用的语文词典里, 或者索性对这些词

汇不予记录。有争议的语法用法或被认为是堕落、蜕化、腐败或错误的其他用法，则干脆略而不收。换句话说，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讲罗曼语国家中编纂的词典，以及在苏联因不同理由而编纂的词典，带有明显的传统性。

参照 1917 年以来的俄语，这个论点可以看得更为明显些。已故著名的俄语翻译者麦克斯·海旺德，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① 中一篇光辉的论文中曾经指出：

“[1917 年俄国革命以后]，为了在语言文字上立即同旧制度决裂，许多传统的头衔称呼都禁止在官方的俄语语言中使用，即使这些头衔称呼在开始时很难从普通的用语中分裂开来。”他还讲了许多，我把他的长话短说了：许多这样的词后来都恢复使用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初期，除了引进了这种新官方术语外，俄语的词汇增长多少是不带有官方授意倾向的。有一大批词汇是来自俚语、方言、职业行话和外来语。可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斯大林当政下，这种事情有了更为严紧的规定，在中小学校，在报纸、广播和文学著作的语言使用方面，~~强迫实行~~一种明显的规范化的方法。过多的使用外来语词，被认为是不爱国的。与此同时，由于当时苏联与西方文化影响隔绝，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词汇，来自年轻的独树一帜的文化人士的专业词汇，俄语是从来不引进到常用之列的，而这些词汇当时是在大量进入西方普通人民的日常语言中的。例如，来自精

①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78 年 11 月 17 日，1339 面，评论科姆利和斯通《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语言》。

神分析专业语言的英语词汇,如 inhibition(抑制)和 repression(压抑)等对个人情绪发生影响的词,在英国和美国已成司空见惯了,但在苏联,除了专业杂志外,对应的概念是无人知道的。同样,英语的外来词拥进了法语、荷兰语、德语、日语等,可是,直到最近几年像 bikini(女游泳衣)和 hobby(业余消遣)等这样的词汇才开始出现在俄语里,其数量也决不如在其他语言中那么多。

不论是在 1917 年以后的苏联,在 1789 年大革命后的法国,还是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发展,都很自然地要在有关国家的语言中反映出来,要按照词汇在规范化词典中表现的方式反映出来。

- 8.2. 自从约翰逊博士以来,英国大多数词典编纂者认为,在词典中选收新词是非常受人欢迎的,但鉴于这是任何语言中一个不稳定的领域,人们在新词的选收和翻译方面必须慎重,在一部双语词典中,人们往往要费很大的力气挑选一个词才能找到该词在归宿语言中的对译词。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在英国和美国,有少数极其英勇的年轻人,从事一种“悬空滑翔”(hang-gliding)的消遣游戏。这种年轻人装在一个风筝式的装置里,从悬崖峭壁或别的高地,脸部朝下,投身空中,然后朝着山谷底,轻轻漂动而下,并利用气流,帮助他完成下滑的旅程。这种游戏在七十年代的初期始创于北美洲和英国,今天,悬空滑翔这个词和相应的一个词悬空滑翔者一起,都出现在大多数规范化英语词典中了。我在几种欧洲语言中寻找这个词,我发现英法、英德等规范化双